

科学范式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范式之争

杨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39)

摘要:利用库恩科学范式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不可通约”, 本文探讨了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之间的关系与本质区别。不同翻译研究范式对翻译研究本体的认识不同, 以此为切入点, 本文指出, 翻译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是唯一的, 现象世界是多样的。翻译研究的范式之间并无高低之分, 不同范式之间的交流, 有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 但这需要不同范式学习彼此对翻译研究基本概念的不同定义。

关键词:翻译研究; 语言学范式; 文化范式; 科学范式理论; 不可通约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17)02-0044-04

一、引言

2012年, 国际著名翻译研究期刊 *Target* (《目标》) 发表了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的文章《站在十字路口的翻译研究》^[1]。在巴斯奈特看来,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 其根基已愈来愈稳。然而, 与此同时, 它却并未成功挑战世界文学、后殖民等学科已经超越的那些正统的观念。她建议, 处于“十字路口”转折点的翻译研究应向其他人文学科拓展, 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巴斯奈特“十字路口”的隐喻, 令人联想到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2] 中提出的“范式转换 (paradigm shift)”理论。库恩将科学划分为“常规科学 (normal science)”与“特别科学 (extraordinary science)”两类。“特别科学”又被称作“革命科学 (revolutionary science)”。在某个特定的学科内, 常规科学是较长的时间阶段内的主流, 其特点是保守、尊重传统。它以之前的研究典范为模板, 在某个主导范式内运作, 其研究不以检验、挑战该范式为目的。然而, 这种常态会不时被各种危机打断, 有时甚至遭遇变更, 继而引发范式转换, 这是因为主导范式已无法应对新的研究课题。近几十年来, 翻译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然而这门年轻的学科也经历了不少特别的, 甚至是具有一定革命性质的转向。

对于“范式”这个概念, 库恩在理论建设初始并未给出明确、精准的定义。因此, 这一概念常被从多角度解读, 广泛应用在社会科学中。即便库恩本人

在后期反对将“范式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 其理论能否完整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 学界仍存有争议, 正、反两种观点都有许多拥护者。对此, 笔者赞同正方的观点。库恩“范式”概念虽然有模糊不清的成分, 但这个概念却明确地指向一个“学术的共同体”。“范式”概念浓缩的就是这个“共同体”产出的具有较高共性、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的知识总和。“范式”概念, 以及库恩在其理论的“语言转向”之后对“不可通约”概念的重新认识, 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翻译理论研究不同派别之间的共性与区别。例如, 翻译理论研究从仅关注如何实现语言间转换的完美对等, 到关注翻译实践发生的社会语境, 这其中的改变未必是自然科学式的、彻头彻尾的革命。也许把翻译研究中的“范式”理解为认识翻译问题的不同“视角”更为妥当, 更不易引起争议。但是, 抛开“范式”难以界定的概念内涵与外延, 不论是“范式”“转向”, 抑或“视角”, 都意味着研究路径上的不同取向。因此, 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 尤其是其中的“不可通约”概念,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把握翻译理论演变中的脉络。

二、不可通约: 不同的“词典”

“不可通约” (incommensurability) 原本是个数学概念。库恩借用这个概念, 指同一学科内不同范式的支持者对研究的内容、定义、标准等存在认识上的矛盾。某一种学问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不同的范式对此描述不尽相同。例如, 哥白尼提出地球是

收稿日期: 2016-11-03

作者简介: 杨超 (1979-), 男, 河南郑州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可以转动的,却遭到世人的否定。在人们当时的概念中,“地球”的内在定义包含“不可转动”。因此,哥白尼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让地球转动,更在于以全新的方式看待物理学与天文学问题,而这种方式改变了“地球”“运动”等基本概念的定义。没有这些概念上的嬗变在先,地球可以转动的想法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不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归根结底在于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范式内的学者虽然观察的是同一个世界,然而在某些领域,他们看到的现象并不相同,其视野中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2]147-150}笔者认为,这种认识用来审视翻译理论的不同研究倾向,同样十分有益。

库恩的理论后来受到社会科学“语言转向”的影响。他借用翻译中的“不可译(untranslatability)”来说明理论间的不可通约,且并非是绝对的。库恩划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翻译过程: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译者使用目标语中的词语系统地取代源语,在这个过程中,源语和目标语都没有任何改变;另一种是解释性翻译(interpretative translation),涉及语言之间的妥协,要么在一种语言中增加新的概念,要么对原有概念的细节加以改动。^{[3]671-673}例如,在翻译某种完全陌生的部族语言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必须先学习这个部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习惯,并将这些知识吸收到目标语中,然后才能进行翻译。也就是说,两种理论的不可通约、“不可译”,仅在第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中才会出现。

两种翻译概念的划分体现了库恩晚年思想经历的“语言转向”。他开始借用“词汇系统(lexicon)”从语言层面解释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所谓“词汇系统”是指语言共同体使用的一系列用来描述世界的语汇。词汇系统与人们生存的世界或掌握的概念相对应,是人们生存的现象世界的基础。词汇系统的内部具有结构性,各个词汇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定义。从本质上讲,不同的词汇系统反映人们对世界不同的分类方式。当理论革命出现时,同时也是现有的词汇系统无法解释说明新概念、新发现的时候。当人们对世界的根本分类发生变化之后,旧的范式中原有的那些概念的定义、外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lexicon”在汉语里有“词典”的意思,借用这个意思打个比方,身处不同范式里的科学家,参照使用的词典是不同的,因此不阅读对方的词典,不学习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思想。库恩经常使用的天文学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托勒密认为行星围绕地球转;哥白尼认为行星围绕太阳转。他们的理论大相径庭,反映

到语言结构的层面,是因为在他们的“词典”里,“行星”的基本定义、外延是不同的。库恩的范式理论深受康德主义的影响,讲究客观世界与现象世界之间的区别,认为科学共同体同时也是语言共同体,强调正是以词汇系统为核心的语言标记了不同科学共同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不同视角,阐释了不同范式间不可通约、不可译的深层原因。

三、不同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本体

国内较早关注翻译研究范式的有吕俊^[4]、吴义诚^[5]、廖七一^[6]等学者。2000年,吕俊为翻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理性做了辩护。针对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吕俊指出:“如果范式间有不可通约性,一旦旧的范式为新的范式所取代,旧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也都将与旧的信念一起被抛弃,那么科学的进化与连续性又如何体现呢?”^{[4]43}笔者赞同此观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时,不能生搬硬套,以偏概全。“不可通约”源于一个几何概念,即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无法比较、公度,因为缺乏直接比较二者的度量单位。可见这个概念本身更多强调的是难以比较,而不是孰优孰劣。在一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范式的竞争是普遍存在的,但这并不影响该知识领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范式完全淘汰另一个范式,在自然科学漫长的发展史中也只是少数,带来的是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这种情况相对更少。在社会科学中,“绝对不可译”仅在学术界的“语言共同体”根本不尝试学习对方的“语言”时才会发生。翻译研究不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与翻译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此外,由库恩引入的“范式”概念本身在定义上就相对灵活。我们既可以把某一社会学科内矛盾尖锐的不同学派称作范式,也可把彼此联系较紧密,但观点、研究视角略有不同的学派称作范式。总之,即便不同范式间真的水火不容,它们所属的大的研究领域依然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吕俊的观点是在翻译学科地位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意在消除学界不必要的顾虑,共迎翻译研究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世纪之交后至今,围绕翻译研究范式国内多位学者贡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的着重关注某一个翻译范式,有的关注其他学科理论对翻译范式形成、发展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彭甄^{[7]102-105}梳理了翻译研究的几个主要范式(学派),如“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多元体系学派”“解构主义学派”等,并指出“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的文化研究是主要潮流与趋

势。早期翻译研究以应用为导向,致力于确立翻译的具体规范、原则等,是规定性的;翻译的文化研究则是描述性的,“将翻译及译语文本置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互动的文化语境中,将目光投向翻译这一特殊言语行为的表现及事实”^{[7]104}。彭甄的研究肯定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将翻译、译本放在互动的两个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具有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但同时强调翻译的文化研究不能做泛泛之论,成为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佐证。他指出,翻译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翻译的“内部研究”即结构研究上,即便翻译的文化研究也应注意语言学范式并未深刻探讨的翻译的性质、过程等结构性元素,始终将翻译的研究立足于语言,而不只是文化。语言与文化是水乳交融的,语言自始至终都是属于语言共同体的交际工具,因此很难说立足于文化的翻译研究就脱离了语言这个基本层面。哲学、历史等学科出现的“语言转向”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究竟是两条路,还是会重合、交汇成一条路?换言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若是脱离了那些结构性的、语言层面的研究,会不会变成其他学科的一个分支?这种疑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学界普遍存在的两种焦虑: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的矛盾关系。

笔者认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并非依赖于它对其他学科的排斥。只要是探讨翻译问题的都行,可以把视野放更广一些,多吸取其他学科所有可以利用的精华成分。比如,许多医学专业的学术期刊都以开放的态度发表了大量涉及中、西医翻译的学术成果。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科学(中医临床基础)博士学位论文也包括《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伤寒论〉英译的比较研究》^[8]和《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多文本中〈伤寒论〉英译探讨》^[9]等。这些论文立足于翻译,研究中医临床问题。医学专业的学者跨界翻译专业,并没有影响中医学科的独立性,因而翻译专业的学者跨界其他专业,也没有理由担忧翻译学科的独立性会遭受任何破坏。其实,这种焦虑归根结底在于翻译研究长期不被重视,被认为无理论可讲,且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学科。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才是新兴学科茁壮成长的必由之路。否则,追求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时反而会成为束缚学科发展的壁垒,引发不必要的焦虑、纷争。

语言学学派与文化学派是当前翻译研究的两大主要范式。在国内,两派之间的观点碰撞较为激烈。语言学学派的代表学者有张柏然^[10]、吕俊^[11]、赵彦春^[12]等。他们批评文化学派的研究执着于外围研

究,消解了翻译研究的主体。以谢天振^[13]等学者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则坚称自己的研究并未脱离翻译研究的本体。在他们看来,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单纯的语言间转换,还包括社会、文化等文本之外的诸多因素。文化学派对翻译的定义均相对宽泛,引入了“功能”“社会”“读者接受”等诸多因素,更加关注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碰撞,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效应。语言学范式内的学者更加关注以何种操作技术与规范实现源语、目标语之间的最大化等值。可见,翻译研究的本体只有一个客观世界,“现象世界”则因范式不同而迥异。回顾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以及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拯救了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使其走出无休止的、探讨世界本源的泥潭。相应地,如果把翻译研究本体的“客观世界”与“现象世界”混淆,抛开彼此不可通约的范式去讨论翻译研究的本体,也将徒劳无益,哪一方也无法说服另一方。

厘清了这一点,再看译界关于翻译本体的争论,轮廓就变得更加清晰。2004年,吕俊在《外国语》发表文章,肯定“文化转向”能开拓译学研究的新局面,但也强调其中的危险:“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弭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14]57}他认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离心式的”“外在的”,翻译研究应以语言为核心,“主要依赖其内在研究,即本体研究”^{[14]59}。“语言学派”的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赵彦春指出,“文化派译学研究虽不乏善可陈,却是一步步走向了歧路”,文化学派研究的是翻译中的边缘性东西,从历史、文学、政治等角度切入,“与翻译的本位研究恰是南辕北辙的”^{[12]24}。

针对语言学学派的观点,谢天振^[13]撰文予以回应。他考察了西方语言学派内部的发展历程,发现最早从奈达开始,许多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学者在研究中不失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照,比如英国学者哈蒂姆(Basil Hatim)等。一些在学术生涯早期使用语言学研究翻译问题的学者,如梅森(Ian Mason)、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贝克(Mona Baker)等如今已开始从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视角进行研究,文本内的对等关系不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谢天振指出,一些学者混淆了“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翻译本体代替了翻译研究的本体。在他看来,即便语言间的转换是翻译的本体,翻译研究如果要

研究翻译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将译者、接受者、社会、历史、文化等语境都纳入翻译研究的本体的范畴之中。因为大家都承认,“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翻译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恰恰依赖于其研究对象的广泛包容。^[13]谢天振通过区分“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两个概念论证自己的观点,不如直接使用“不可通约”的概念清晰明了,“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的提法类似一种让步式的迂回论证。其实,在文化范式的理论框架中,学者们即便直截了当地指出“翻译的本体”不是文本,而是以译者为核心的诸多因素的集合,也是合情合理的。归根结底,他们使用的“词典”不同,对翻译的定义也不相同。

四、结语

社会科学内的流派、范式等往往不是一方淘汰另一方,而是既具有共性,又有明显差别,彼此共存。翻译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是唯一的,“现象世界”却是多样的,取决于学者们使用的不同视角。“科学范式理论”中的“不可通约”概念可以用来考察不同范式所使用的不同视角之间的本质差异。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翻译研究能否长期保持独立的地位,不像过去那样成为语言学、比较文学的一个部分,将来也不沦为某个社会学科的研究子项,这是翻译理论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甚至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焦虑。这种焦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会让翻译研究工作者更加努力地学术创新,维护翻译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也容易造成故步自封的保守倾向,对“外围”的、“交叉学科”的研究过度警惕。

语言学范式是翻译研究内第一个相对稳定、常规化的范式,因此,这个范式内的保守倾向也似乎更浓重一些。文化范式源自对语言学范式的继承与超越,源自对源语、目标语社会文化的重视。文化范式从一开始就借用了语言学的社会化研究成果,以及哲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将它们用来考察翻译问题。因此,文化范式的跨学科性相对语言学范式也略强一些,对新观点、新潮流的开放度也略高一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化范式中的“操纵学派”“目的论”“功能学派”等本身也有自己的理论侧重点,一样容易因自身理论视角的局限性而忽视更大的画面,束缚翻译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从“不可通约”的概念内涵看,不同范式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并不相同,范式内学者手持的“词典”并不相同。比如在“翻译研究的本体”等基本问题上,语言学范式与

文化范式哪一方也不可能真正说服另一方。笔者认为,两种范式并无高低之分,它们的侧重点天然不同,用一种范式的标准评判另一种范式内的研究,只会使问题越看越多。当然,跨范式、跨学派的交流与借鉴是有必要的,但批评者首先要掌握其他范式的“语言”,查阅他们的“词典”,这样批评才能更有意义、更有建设性。不同“科学共同体”的学者若能潜心学习彼此的“语言”,就能更深刻地把握彼此范式的基本理据与研究方法。毕竟,不论范式为何,同一学科领域内的学者观察、研究的是同一个客观世界。翻译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理论体系仍在建设之中,多种范式共存、竞争,有利于这门学科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at a Cross-roads [J]. Target, 2012, 24(1): 15-25.
- [2]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3] Kuhn, T. S. 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 Communicability [J] // PSA: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982: 669-688.
- [4] 吕俊. 关于翻译研究中的两种范式问题——读《翻译学: 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9): 42-45.
- [5] 吴义诚. 论翻译研究的科学范式[J]. 外国语, 2001(5): 55-60.
- [6] 廖七一.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J]. 中国翻译, 2001(5): 14-18.
- [7] 彭甄. 翻译研究: 范式转换与选择[J]. 外语学刊, 2004(6): 102-105.
- [8] 奚云飞.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伤寒论》英译的比较研究 [D].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2.
- [9] 杨乐.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多文本中《伤寒论》英译探讨 [D].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4.
- [10] 张柏然, 辛红娟. 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501-506.
- [11] 吕俊, 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2]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13] 谢天振. 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J]. 中国翻译, 2008(5): 6-10.
- [14] 吕俊. 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 外国语, 2004(4): 53-59.

[责任编辑 亦 筱]